

# 发展中的精神分析学

——从荣格、霍妮到拉康

杨倩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通常被学界称为经典的精神分析学。但是, 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并未被他的后继者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弗氏的得意弟子荣格首先提出“集体无意识”向其发难, 将无意识研究从单纯的医学实践转向考古学、神话学和人类学, 由此开创了分析心理学派。继荣格后, 社会精神分析学的主将霍妮又对弗氏理论对文化的轻视提出质疑, 从社会文化角度考察女性心理, 同时在亲子关系的界定上广泛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社会性解读。196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 拉康开始将目光投向结构主义, 架起了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桥梁, 在对词语给予特殊重视的同时, 通过“镜像阶段”和主体心理三层结构论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 从哲学的高度构建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使其在后现代语境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关键词:** 精神分析; 荣格; 霍妮; 拉康; 无意识;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5)04-0037-06

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从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乃至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 各个理论流派纷纷著书立说, 企图在文艺理论领域独领风骚。与诸多流派走马灯似的更迭相比, 诞生了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更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精神分析学自崛起于20世纪初起, 就从未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忽视, “精神分析也早已超过了弗洛伊德那纯粹的医疗含义, 而成了一种渗入科学的每一领域和知识界每一王国的世界性运动”<sup>[1]</sup>。尽管精神分析学自问世以来, 各个领域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利用大相径庭, 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毁誉各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几乎20世纪东西方的主要作家和批评家都对精神分析学表示出了自己的兴趣, 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那么为什么精神分析学会在百年的文艺理论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为什么在各种思潮流派竞相争斗的今天仍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它情有独钟呢? 可以说, 除了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巨大声望和其他思潮对它的影响外, 更重要的则是, 精神分析学自身的

断发展、演变、自我修正、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 这种“发展性”的批评使精神分析学在百年之后仍然成为作家和批评家的有力武器。本文仅就精神分析学内部的“发展性”批评作一述评。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心理学家, 他在许多方面修正、丰富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帮助奠定了精神分析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荣格本来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 1912年荣格发表《潜意识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并中断友谊, 次年, 随着两人分歧的加深, 弗洛伊德宣称荣格不再是精神分析学者, 1914年荣格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职务, 创立分析心理学。

对力比多的不同解释是两人公开分歧的开始。弗洛伊德奉行科学主义, 他对力比多的解释更多的是从病人的临床经验和实验研究出发, 他所定义的力比多是生物决定论的, 是由性和攻击的能所组成的人格驱动力, 人生存的主要动机即来源于获得生理需要时的满足感。在他看来, 人的生命是受力比多驱使的, 在力比多的驱使下人才能向无限的自我满足发展,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的这种界定也

收稿日期: 2005-03-03.

作者简介: 杨倩(1981-), 女, 甘肃兰州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和当时西方崇尚科学、自我的文化思潮不谋而合。但是弗氏关于力比多的定义显然过于狭隘,人的生存目的也几乎与动物无异。于是他的弟子荣格首先就这一问题发难,将力比多定义为一种普遍的生命能量,性仅是其中一部分,力比多在人格结构中是趋于均衡的,正常人的生活目的只是在相反的事物中寻求均衡。弗氏定义的“个人”是为了追求力比多并在其支配下活动的,而荣格在评价“个人”概念时却始终认为个人并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个性化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正是他能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乃至无机物建立起一种亲密互补的关系。虽然荣格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反驳源于对力比多的不同定义,但使两人最终分道扬镳的却是他们对无意识的不同理解。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童年生活中受到压抑的心理内容,这种心理内容包括了人的各种本能冲动和诸多欲望,弗洛伊德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医疗实践的检验,当他诱导病人说出那些压抑已久的经验和潜藏的欲望时,病人的症状立刻大为好转。但弗氏的无意识理论并没有得到荣格的肯定。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并非源于个人经验,也并非从后天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sup>[2]</sup>。荣格批评弗洛伊德虽然看到了无意识往往具有的古老的普遍形式和性质,却仍然给无意识贴上个人的标签,为了切断与弗洛伊德的联系,荣格的目光开始从单纯的医疗实践转向考古学、神话学和人类学,荣格开始从弗洛伊德推崇的科学主义转向对文化史的研究。通过对古代神话、部落传说和原始艺术中出现的种种意象的挖掘,荣格推断在这些共同意象的背后,一定有他们赖以产生的共同的心理土壤,这种集体的梦、幻想和想象是超越个人的原始意象,正是它们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普遍的、一致的深层无意识,由此荣格提出了与弗氏迥异的,也是贯穿其理论的核心概念——集体无意识。有人曾用海岛对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作了精辟的比喻,高出水面的部分代表意识,水面下由于潮汐运动而显现的是个人无意识,而作为所有孤立的海岛共同基础的海床则是集体无意识。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人类一切文化精神现象,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的偏颇之处做了及时修正,许多文艺作品也随着荣格“集体无意识”<sup>[3]</sup>的提出有了新的误读。对无意识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梦的不同解释,荣格与其老师一样承认梦是不自觉的,自发的无意识心理产物,是未被任何意识目的改变的本性的纯粹产物,梦是一种象

征,是无意识情景的再现。但荣格对弗洛伊德关于象征是被压抑的愿望经过化妆再现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弗洛伊德在释梦过程中将做梦的原因予以简化和还原的方法虽然适用于某些个体,但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复杂多变的人的心理和精神时,无疑具有局限性和危险性。荣格抛弃了弗洛伊德释梦时的简单诱导而采用综合建构的方法释梦:他将人类从远古至今的存在比作河流,有诞生的源泉和消失的河口,它流经人类存在的每一个连续序列并留下印迹。集体无意识像一个枢纽联系着序列中的所有人,某阶段的人表现出的某种特征定能在他们远古祖先那里找到哪怕微不足道的印迹,这种能遗传的印迹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核心——原型,对梦的系列分析反过来又印证了集体无意识的普遍存在。荣格通过对梦的集体无意识的分析,深入挖掘了梦所包含的无意识内涵对意识的补偿作用,并利用综合建构的方法将梦的意义进行放大和增加,促使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沟通、对话。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过程中,个体实现心理的转化和平衡。

由于在无意识这一精神分析核心理论中存在的分歧,导致了师生两人关于“艺术创作动力论”的迥异观点。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这种欲望往往是来自童年时期的经验又常常伴有性的色彩,更多的是后天的个人的东西。按照弗氏理论,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激情和冲动完全来自于个人见不得人的欲望和动机而与“崇高”一词无缘。荣格坚决反对这样解释创作,他认为创作激情不是来源于弗洛伊德的性欲,也不是源于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权力意志,而源于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而且它们不是通过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植根在无意识深处并在那里获得全部力量的。柏拉图曾认为:艺术创作就是“神灵凭附”,诗人就是“神的代言人”<sup>[4]</sup>。而在荣格这里诗人是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艺术家作家不是要观察生活,而是从现实生活中退回自己内心,从而沿着精神发展的方向返回其最初的故乡——集体无意识。这也为现代主义“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创作口号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荣格的这种理论也出现了问题,既然孕育在艺术家作家心中的艺术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它“完美无缺地从作家笔下涌出,仿佛是完全打扮好了才来到这个世界”<sup>[5]</sup>,那么艺术家作家个人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实践岂不是无任何意义可言。这也是人们对荣格学说提出的最大质疑之一。

如果说,弗洛伊德在无意识的探索中,在对个

体意识的无限推崇中找到了西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精髓，在性的窗口下窥视生命的本质，那么，荣格则置身于人的世界外，在集体无意识中以一种更富哲学意味的方式观察现实。荣格关于力比多的定义，对梦的解释尤其是集体无意识理论的贡献，修正了鄙视哲学的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避免了精神分析学的狭隘化。

## 二

卡伦·霍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或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人物和主要代表。和弗洛伊德、荣格相比，霍妮的精神分析更倾向于心理学领域，与文学艺术的关涉性极少，但作为由传统精神分析学向新精神分析学转型的桥梁式人物，有必要将她对弗氏创立的传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做一述评。

弗洛伊德自诩为“科学家”，他的理论是生物学定位。霍妮批判了弗氏理论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因素而忽略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倾向。她经过了大量分析研究确定了其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定位。霍妮在她的临床实践中发现，美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力比多，而是当时经济大萧条时的失业、住房、食品等一系列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迫使人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应用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理论显然不能排解现实中人们的困惑、焦虑、紧张情绪；此外，霍妮在考察女性心理的形成时也对弗洛伊德的“生理构造即命运”<sup>[6]</sup>的观点提出质疑。传统精神分析学认为女性的心理特点、人格发展都是由先天的生理解剖决定的，霍妮通过对女性的阉割情结、受虐狂倾向等问题所做的大量精神分析，认为女性身上的特点实际上并不完全由生理原因造成，生理的结构和特点固然是女性心理特点的生理基础，但作为自然人的同时女性还是有着七情六欲的社会人，女性对自身生理特点的体验必定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尽管霍妮当时并没有明确界定社会文化与心理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但从她对女性心理的研究中，对过分强调生理因素决定作用的传统精神分析学进行了及时的反拨。正是由于霍妮理论的社会文化定位修正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轻视文化因素的弊病，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虽然在精神病治疗方面，霍妮仍主要采用弗洛伊德倡导的一些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如释梦、自由联想、对病人童年生活经历的重视等。但神经症缘何产生，霍妮却有着独到的见解。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产生于本我与自我间的冲突，对

力比多的压抑是产生疾病的根源所在，当个人欲望和社会需求相冲突时必然导致神经症的产生。但霍妮却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神经症产生的原因，霍妮承认个人欲望和社会需求的冲突是神经症产生的条件，但仅此一点并不必然产生疾病，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因此，精神病的根源必须到环境中寻找，疾病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文化环境，而其中的人际关系障碍直接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精神分析学的不断修正发展不仅对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在文学领域中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成了许多作品的创作主题和批评方法，使许多作品出现了新的误读，也体现了传统精神分析对文学的强力渗透。在弗洛伊德看来，俄狄浦斯情结是无处不在的，比如儿童对父母的依恋、爱意、恐惧等都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文学作品中的亲子关系不仅带有柔情的意味而且带有敌对的色彩。总之，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为了说明人际关系的最终基础仍然是性冲动。霍妮充分肯定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但她反对弗氏关于儿童对父母的依恋是由于生物学原因的观点。霍妮认为，亲子关系是环境的产物，孩子从小生活在需要成人温暖、关注和爱的环境中，这些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他们的父母，父母缺乏对子女的温暖和爱或者给予子女虚假的爱，都能通过父母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并被敏感的儿童所感受。父母不良的态度和行为会使儿童心中产生对父母的敌意，但由于无助、恐惧，儿童必须压抑自己对父母的敌对心理，这样儿童陷入了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窘境中，“为了克服焦虑，儿童便会依赖父母中的一方以获得安全感，并错误地把‘依赖’视作对父母一方的‘爱恋’”<sup>[7]</sup>。从表象上看，它与弗氏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致，但其动力机制却不是力比多，而是克服焦虑，获得安全。弗氏的乱伦性依恋是为了得到爱，释放能量，儿童一般会依恋引起异性爱的父母一方。霍妮认为由焦虑引发的性依恋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儿童会依恋更强大的父母一方。霍妮对俄狄浦斯的新解显然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凸显了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这一理解似乎更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关于俄狄浦斯情局限性的批判。

尽管霍妮早期受过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但她并不是简单地、盲目地照搬弗洛伊德的观点，她在大量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改变了精神分析的生物学研究

取向,确定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方向,丰富了精神分析的内涵。

### 三

霍妮对传统精神分析学全面系统地批判引起了精神分析学研究方向的转变,而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修正则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学说新的兴趣,从而使之更加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批评。雅克·拉康试图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来修正和重新阐释弗洛伊德主义,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途径“返回弗洛伊德”。拉康的“返回”并非线性运动而是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曲线救国”。拉康所谓的无意识正是严格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一种个人的、动力的体系。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是依据生物学原理来思考无意识的,即将其看作原始的动物本能的储存。拉康则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认识无意识,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这一观点的依据来自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中,一个符号表示两个不同领域间的碰撞和粘合,而这两个领域就其自身来说是漂移浮动的,这就是思想概念与声音图像,即所指与能指。索绪尔认为:所指与能指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符号具有任意性,这种任意性又导致了能指与所指的分裂。拉康吸收了索绪尔的分裂观,对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的对称和粘合提出了质疑,并“赋予能指以优越性”<sup>[8]</sup>。拉康认为,符号的任意性必然说明从能指到所指、从语言到意义或从人类行为到其心理含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自主的或自明的转换。在精神分析学中,人们要注意的正是能指与所指间的这种断裂和不稳定的关系,而这正是弗洛伊德忽视了的信息源。拉康用能指与所指代替了弗洛伊德的“物的呈现”和“词的呈现”,在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重新解读,拉康发现了无意识—语言—梦之间的活动规律的相似性。在借助索绪尔的术语完成了无意识与语言相统一的第一步后,拉康接下来通过研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完成了以语言学的隐喻和换喻机制来代替无意识活动规律的伟大工程。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梦主要是某种愿望的达成,但在梦里愿望的达成是被某种防御机制掩盖着的,愿望必然是以扭曲的形式得以呈现的。因此,弗洛伊德在释梦中假定梦是由两种精神力量运作的:一种建构梦所表达的愿望,

另一种则对梦的愿望进行审查,无意识的梦的形式过程终将把所指掩盖起来,使其不得辨认。在拉康这里,他更愿意像结构主义者一样以语言理论为出发点,他指出:无意识的梦的思想和语言中的“能指”一样,是相互联系的,而作为梦的机制的无意识操作——凝缩、移置、象征则是雅各布森语言学上的隐喻和换喻的等价物<sup>[9]</sup>。由于梦的凝缩和移置两种作用,使我们难以理解梦的真实意义——梦的思想或无意识,用语言术语来说即凝缩和移置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能指,而所指的部分则无法固定在这些能指的下面。梦的思想也像能指一样是漂浮的,它们并不与任何特殊的所指因素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显梦与隐梦之间存在着多重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经由凝缩和移置两种作用形成的。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阐释的梦的凝缩,移置这两种构成性作用,都成了他通过能指而对无意识进行修辞诠释的工具,并将其与雅各布森的隐喻、换喻进行了简单的同义组合。由此,拉康得出结论:无意识可比拟于语言的话语或文本,其组成规则与语言规则类似,弗洛伊德从梦、玩笑和临床症状中发现的无意识活动规律在语言学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拉康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把弗洛伊德原本从经验上无法证实的无意识看作一种类似语言的结构,从而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联系。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在给词语表现以特殊重视的同时,还通过“镜像阶段”论和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新阐释,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对人的心理结构进行区分,形成了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另一理论基石——主体论。

在弗洛伊德那里,个体发展过程是力比多能量转移的过程,当力比多由自恋力比多转向对象力比多时,个体才能区别主体与他者,逐步确立起主体性。拉康的研究却带有强烈的反生物学倾向,其主体理论的形成是与其著名的“镜像阶段”论为基础的。拉康从法国儿童心理学家瓦龙那里借用“镜像阶段”这一概念并对此做了精神分析学的阐释:人类在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控制和协调自身的,这种“动力无助”和“无为”状态,直至婴儿发展到六个月时,开始逐渐得以改变,这时婴儿开始从镜中之像中认出自己,虽然还不会用言语表达,但婴儿却会在镜前做出各种动作来表示对发现自己的喜悦<sup>[10]</sup>。拉康认为也就是在这个神秘的瞬间,意识悄然确立。当然镜像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婴儿对自身的确认经历了三个步骤:起初,婴儿把

自己的镜像看作现实的事物，还不能区分镜像和自身、他人镜像与他人的差别，这时婴儿的自我意识是混乱的；接着，婴儿开始逐渐意识到镜像不再是现实的事物，而仅仅是他人的镜像，虽然婴儿已经认识到他人镜像与现实中他人的区别，但他仍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随着神经系统的成熟，婴儿终于觉察出镜像就是自己的，这时婴儿发展出一种想象的能动性 and 完整感，初步确定了自身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镜像阶段是每个人的自我初步形成的关键时刻，镜像阶段的结果是使婴儿从一个混沌之物发展为一个心理化的个体。由此拉康认为，镜像阶段就像是一种符号纸版，“自我”以其最初的形态集中到这一纸版上，自我的确立依赖于一个外在于自我的第二者——婴儿镜像的存在，这时完成了拉康所谓的“一次同化”，同时自我尚未在与“他者”视为同体的辩证法基础上客观化，它的主体作用也由于语言的缺失而无法显现。不难看出，镜像阶段中婴儿与其影像仍然是一种想象关系，婴儿对自我的整体性认识也处于拉康所说的想象界，直至婴儿掌握语言后，才由想象界进入符号界，而主体的真正确立正是在符号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论及儿童主体形成过程时是以亲子关系为主，由此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也成为精神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石，拉康的主体理论以主体间性的关系为出发点对这一学说做了进一步补充论述。在拉康这里，俄狄浦斯情结期是幼儿通过意识到自己、他者与外界区别而逐渐使自身“获得主体性”的时期，这时，幼儿欲在社会—秩序的符号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接受“父亲”的权威，必须进入由语言符号组成的符号秩序。拉康的俄狄浦斯情结并非纯粹生物学的探讨，而将这一情结的发展从语言学角度做了划分。在语言尚未出现的镜像阶段，儿童与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儿童与母亲之间是交融的统一体，婴儿还没有为自身争取到语言上的替代身份，还不能拥有一个“名字”和讲话的位置，因而在这个缺少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儿童的视野中只存在对母亲的认同。在第二阶段，由于父亲的出现使原来一对一的母子关系变成了儿童、父亲、母亲的三元关系，这里拉康引入了“父亲的名字”<sup>[1]</sup>这一术语指称“父亲”的法规和压抑，这里的“父亲”已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父亲而仅代表一个位置或一种功能，“父亲的名字”则代表一种法规、一种家庭和制度的制度。因而，儿童对“父亲名字”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文明社会先在于他的法规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拉康强调了语言所起的作用，认为父亲是通

过先在法规来体现其存在的，而这套法规就是他的言语。此时，象征性的父亲引入了法的规则，使儿童开始接触到语言及其规则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样儿童自我肯定的先前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儿童在现存的语言系统中习得了父亲的一套法规，父亲不再是他竞争的对手而是他模仿、认同、学习的对象。儿童与父亲的认同是他主体性发展中的“二次同化”，这样经过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屈从于语言而获得主体性的儿童便由自然人进入到了文化的符号秩序中了。

拉康的“镜像阶段”论和俄狄浦斯论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否定，而他从结构学出发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分析更是对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三分法的进一步颠覆。1953年拉康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想象、符号与实在的三层结构说。想象界源于幼儿对“镜中之我”的经验，它产生于镜像阶段但并不随镜像阶段的消失而消失，它会继续发展深入到成人主体对他者和外部世界的经验，想象界既是一个特定的阶段如婴儿对自身影像的认同，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主体对任何对象的理想化认同都是为想象界所支配。婴儿对自我的认识是产生于镜像阶段的，因而自我与想象界相联系，他的自我仅仅是自我的理想，是在想象或误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而视之，想象界是人的个体生活或人的主观性领域，它在主体的个体历史的基础上形成，文化环境使个体形成其特征的所有一切。同时，想象界是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这个阶段的自我设计是虚幻的、想象的，它是无知的领域但与现实界的不同是，想象界可以在精神分析揭示无意识的过程时被把握。拉康符号界概念的提出受到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影响，将研究中心从镜像转移到言语活动。如果说，想象界执行着类似弗氏“自我”的功能，那么符号界则类似弗氏的“超我”，只是它不具有超我的强制性质。符号界通过语言同整个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连，个体依靠符号界来接触文化环境，同他者建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化，开始作为主体而存在。人类主体通过语言形成，主体是言语的主体和面对语言的主体，言语是说者与听者对话的序列。在接触语言的过程中，儿童逐渐觉察到，一个符号只有区别于其他符号才有意义，同时一个符号必须以它所指示的客体不在场为条件。这样，拉康宣称：“主体的存在必须依赖于其他主体对他的认识。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语言产生了‘我’，语言创造了人的主体性。语言既是我们表述生活经验

和进行思考的工具,同时由于语言的介入,个体自身也被语言异化,分裂,在语言体系中重建一个理想的‘我’,这样主体将自身从语言中分离出来直接导致无意识的形成。”<sup>[12]</sup>在符号界中,主体与他者相互区别,相互认识,另一方面,在语言这一自主性结构中主体脱离能指链,成为漂浮的能指,主体在称为符号秩序的能指领域得以不断地重构自身。实在界是拉康三种秩序中定义得最模糊和最难把握的,它不属于言语活动,不可能用象征和想象加以中介化,似乎是超越于主体之外的领域。在拉康看来,实在界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一种脱离语言的主观现实,它是欲望之源,虽然不能被想象、被言说,但它却永远在场,永远是“已在这里”,它是思维不可超越的界限,即使运用精神分析也无法追寻其踪迹。虽然实在界是语言无法探其踪迹的“外部”但它却类似于弗氏的“本我”,是一种主体支配不了的动力。正如拉康所说:实在界产生欲望客体<sup>[13]</sup>。在这个客体作为一个现实因素尚不能接近前,就已存

在对它的需要了;而当需要被满足时,欲望也就消失了。换言之,实在界是外在于能指过程之外的东西,是符号界和想象界的消失点。

拉康通过对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的论述,将其主体论与弗氏的“自我、超我、本我”的人格结构相联系,修正了弗洛伊德理论生物学决定论的倾向。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回归,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也不是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肯定,创立语言精神分析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赋予语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种语言重构的结果不仅促使精神分析学本身发生了后现代性转向,而且其影响波及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阐释超越了纯医学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界限,在发展弗洛伊德理论的同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转移和解构,使精神分析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推动精神分析的不断发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宁. 西方文学家眼中的弗洛伊德主义[J]. 国外文学, 1993 (2).  
 [2][3][4][5] (瑞士)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2. 96. 20. 21.  
 [6][7] (美) 卡伦·霍妮. 精神分析新法[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69. 47.  
 [8][9] (美) 杰弗逊, 罗比.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流派[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48. 152.  
 [10][11] 王小章, 郭本禹. 潜意识的诠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09. 212.  
 [12]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M]. Dorest: Henry Ling Ltd., 2000. 76.  
 [13] 穆斯达法·萨福安. 结构精神分析学[M].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54.

## Psychoanalysis from Karl Jung, Karen Horney to Jaques Lacan

YANG Q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held in high esteem, the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was challenged by m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followers. Karl Jung, for the first time, modified the Freudian theory by suggesting the notion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guided the study of the unconscious from medicine to archeology, mythology and anthropology. Karen Horney examined the cultural and the feminist aspects of the unconscious and scrutinized the Freudian Oedipus Complex. In the 1960s, Jaques Lacan bridged structuralism and psychoanalysis and thus lifted the study of the unconscious to a philosophical plane. The paper is thu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is evolution from the initiators to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Keywords:** psychoanalysis; Karl Jung; Karen Horney; Jaques Lacan; unconscious; structural psychoanalysis

(责任编辑: 李向辉)